

〔明〕楊慎著

王仲輔題

卷首

南齊書
新序
水賦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1207.22
401

升庵詩話纂理

〔明〕楊慎著 王仲鏞 簽證

升庵詩話

525856



升庵詩話 簿證

〔明〕楊慎著 王仲繡 簿證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272號)

在華書局上海發行所發行 江蘇如東印刷廠排版印刷

開本787×1092 1/32 插頁6 印張 20.625 字數 350,000

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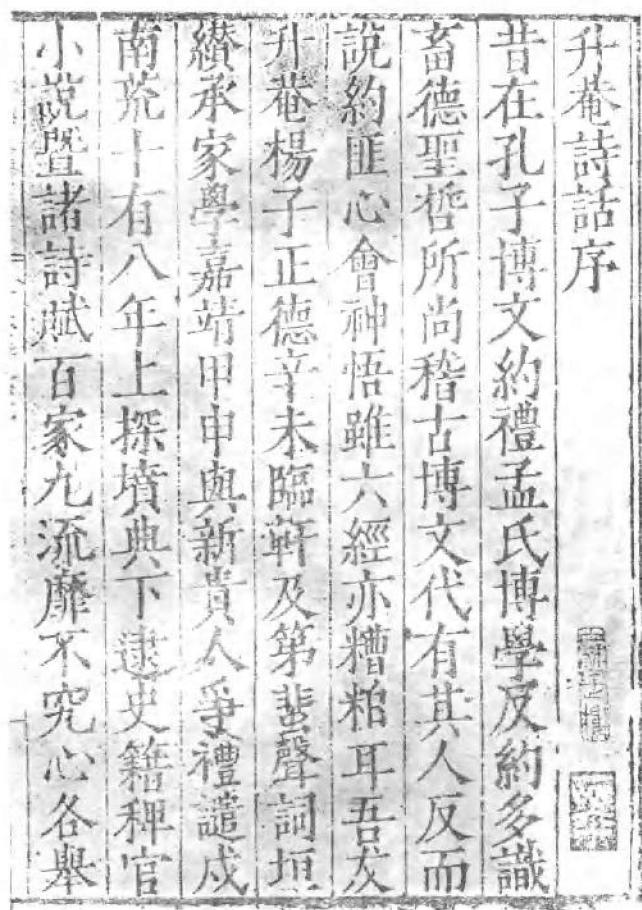
印數：000,001— 3,000

統一書號：10186·748 定價：6.4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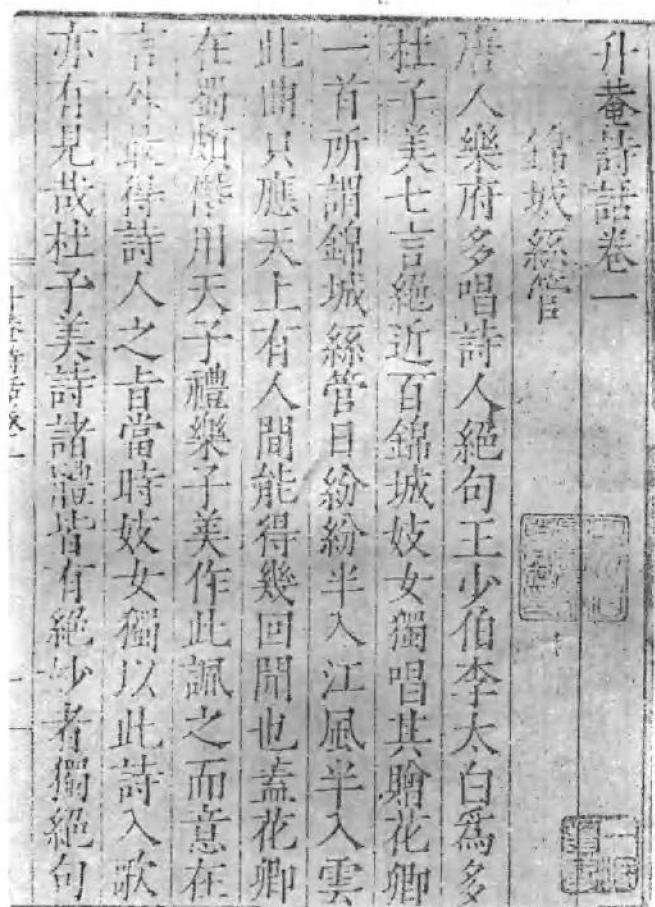


圖一 升庵杖履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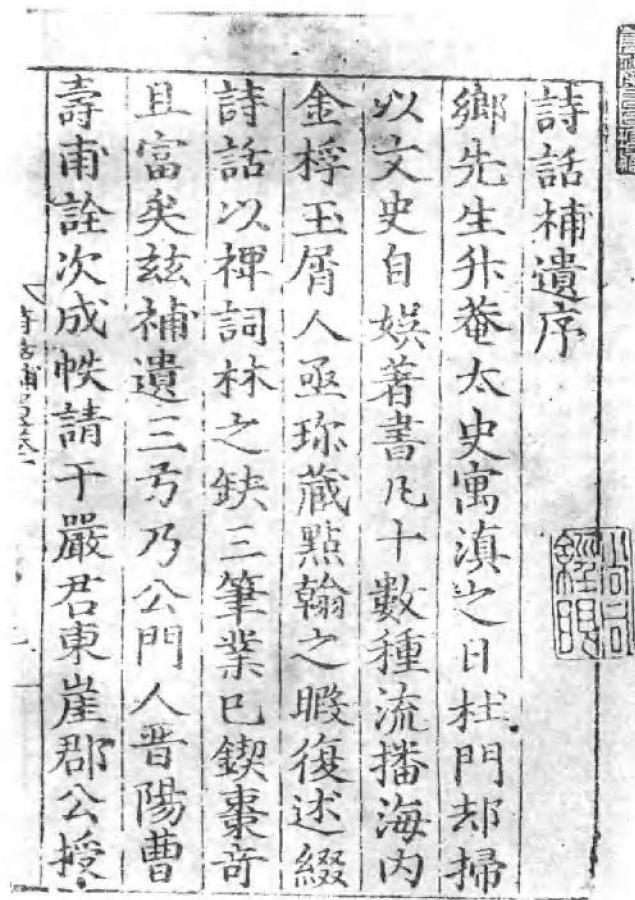
——此生前所繪，石刻舊在昆明高
嶺太史祠中，今已不存。



圖二 明嘉靖四卷本升庵詩話書影



圖三 明嘉靖四卷本升庵詩話書影



圖四 明嘉靖三卷本詩話補遺書影



圖五 明嘉靖三卷本詩話補遺書影

前言

楊慎，字用修，別號升庵，四川新都人。明正德六年殿試第一，授翰林院修撰。嘉靖三年，以上疏議大禮，兩被廷杖，斃而復蘇。旋謫戍雲南永昌衛，時年三十七。嘉靖三十八年，卒於戍所，已七十二矣。升庵既得罪時君，自知不爲當世所容，雖處遐荒，獨肆志文學，著作之富，爲一代冠。身後譽之者固多，毀之者亦復不少，要其緒言餘論，足以傾動當時而影響於後世。今校理《升庵詩話》，因揭橥數端，略論之，以弁於首焉。

蓋升庵生於弘治、正德、嘉靖之世，其始，天下既厭「臺閣雍容之作，愈久愈弊，陳陳相因，遂至啴緩冗沓，千篇一律」（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）。李東陽本宋嚴羽之說，標舉唐音，主情思，

重比興，以爲詩之爲用，乃「以其有聲律諷詠，能使人反復詠諷，以暢達情思，感發志氣」（《懷麓堂文集》卷五《滄洲詩集序》）。又謂「詩有三義，賦居其一而比興居二」。所謂比興者，皆托物寓意而爲之者也。蓋正言直道，則易於窮盡而難於感發，惟有所寄托，形容摹寫，反復諷詠，以俟人之自得，言有盡而意無窮，則神爽飛動，手舞足蹈而不自覺，此詩之所以重情思而輕事實也」（《懷麓堂詩話》）。以是轉移風氣，爲時宗仰。升庵少時，以《黃葉》詩受知東陽，登第又出門下，親承指授，故其生平言詩，實濫觴于此。然東陽好言法度，其重唐詩，亦每於音調句律中求之，加以「歷官館閣，四十年不出國門」（《列朝詩集》丙集第一《李少師東陽》），故其所作，不窺於雄奇奧麗之境，而惟以辭之「簡遠」，意之「古澹」爲高（見《懷麓堂詩話》）。李夢陽一出，譏其「萎弱」，非無見也。

夢陽才思雄鶯，以復古自命，「倡言文必秦漢，詩必盛唐，非是者弗道」（《明史》卷二百八十六《李夢陽傳》）又謂「學詩必須學杜，詩至杜子美，如至圓不能加規，至方不能加矩矣」（何良俊《四友齋叢說》記顧東橋引李夢陽語）。主張太過，又以模擬爲唯一途徑，嘗云：「夫文與字一也，今人模擬古帖，即太似不嫌，反曰能書，何至獨文章而欲自立一門戶也？」（甘作「古人影子」而不辭《空同集》卷六十二《再與何氏書》）。故錢謙益譏之，以爲「但學杜詩聲口，取其

形似，却不知八寸三分帽子，也有戴不得去處。」（《列朝詩集》丙集第十一《李副使夢陽詩註》）升庵喻以「玩瓶中之牡丹，看擔上之桃李」（《答重慶太守劉嵩陽書》），蓋謂其模擬失真也。模擬之不足，繼以剽竊，若謙益所舉《功德寺》諸詩，篇中直寫杜句，至再至三，而詩弊爲甚矣。然當時何景明、徐楨卿、邊貢之徒，皆奉以爲宗，天下無不爭效其體。諸人復互相標榜，排斥東陽。升庵早年與景明訂交，相與論詩，即頻見異同。既而復古之風大煽，遂起而力矯其弊。自言已志，欲振詩風，「永言緣情，效杜陵以上四始」（《答重慶太守劉嵩陽書》）。故其論詩，每發一義，皆所以破李、何。錢謙益云：「及北地侈言復古，力排茶陵（李東陽，茶陵人），海內爲之風靡，用修乃沈酣六朝，攬采初唐，創爲淵雅博麗之詞，其意欲壓倒李、何，爲茶陵別張壁壘，不與角勝口舌間也。」（《列朝詩集》丙集第十五《楊修撰慎》）蓋得其情。然謂不爭口舌，乃就其詩言之，非所以語其持論也。

蓋李、何之病，不在於宗唐，而在於唯古是尚；以爲「漢後無文，唐後無詩」，主張「不讀唐以後書」；謂「宋無詩」，「宋人書不必收，宋人詩不必留目」。又，其病不在於法杜，而在於其專主一家，而所津津樂道者，不過七言律激昂感愴之調，及其「頓挫倒插之法」（《明史》卷二八六《李夢陽傳》引王維楨語），升庵反之，厥標三義：

一曰：「人人有詩，代代有詩。」以爲詩之所始，本乎性情，「六情靜於中，萬物盪於外，情緣物而動，物感情而遷，是發諸性情而協於律呂，非先協律呂而後發性情也。以茲知人人有詩，代代有詩」（《升庵文集》卷三《李前渠詩引》）。此乃上取古人「音由心生」（《樂記》）、「詠緣物感」（鍾嶸《詩品》）之義，以廣東陽「主情思」之說，實亦救其偏蔽。蓋知情思之發，在於境遇；聲音之變，潛與政通，則不至於專於音調句律之間求之矣。是以升庵又云：「或政遇醇和，則膏澤潤乎肸蠁；時值羸頓，則勞苦形於詠謠。」（《李前渠詩引》）持此以觀歷代之詩，如杜公（甫）、范（成大）、陸（游），同寓蜀中，其詩皆推表山川，膾炙人口，而境界各別，「亦其時之遇也」（《東臯（三蜀兩遊集）序》）。以此推之，則凡有以「感物造端」、「托物寓意」，而情與境合者，「豈分窮達，奚別古今」，皆得而謂之詩，自不能專着眼于盛唐一代，杜甫一家矣。

二曰：「尊唐不可卑六代。」以爲漢代之音可以則，魏代之音可以誦，江左之音可以觀，雖則流例參差，散偶贖分，音節尺度，粲如也。有唐諸子，效法於斯，取材於斯。昧者顧或尊唐而卑六代，是以枝笑幹，從潘非淵也，而可乎哉」（《文集》卷二《選詩拾遺序》）？此汎其源也。有其源則有其流，故升庵尤力言：「不可云宋無詩。」（見《詩話》：「劉原父《喜雨詩》」、「蓮花詩」、「文與可」、「劉後村三詩」、「宋人絕句」諸條及《升庵遺集》：《宛陵詩選序》）外此，升庵尚有《宋

詩選》、《六一、宛陵詩選》、《蘇黃詩髓》、下逮《元詩選》、《皇明詩鈔》、《續鈔》以至李夢陽《空同詩選》及並世諸家詩選等。是其博採通識，勝於李何之割斷歷史，專固自擅，亦爲遠矣。

三曰：學詩之法，在於「別裁僞體」，「轉益多師」。升庵嘗舉少陵「不及前賢更無疑，遞相祖述復先誰，別裁僞體親風雅，轉益多師是我師」一詩（《戲爲六絕句》之六），衍劉須溪語羅履泰之說云：「此少陵示後人以學詩之法。前二句戒後人之愈趨愈下，後二句勉後人之學乎其上也。」蓋謂後人不及前人者，以遞相祖述，日趨日下也。必也區別裁正浮僞之體而上親風雅，則諸公之上，轉益多師，而汝師端在是矣。（《詩話》：「杜少陵論詩」條）故所謂「浮僞之體」者，不獨「借助貓兒狗子」之晚唐惡詩（《詩話》：「劣唐詩」條）；空吟不學之九僧江湖（《詩話》：「假詩」條）；若李何「剽竊雷同，比興漸微而風騷稍遠」之作；以至升庵所尚「六朝之調，初唐之體」，使其流於「纖艷不逞，啴緩無當，作非神解，傳同耳食」者，亦當在於區別裁正之列。（《詩話》：「胡唐論詩」條）且升庵亦非不學杜者，嘗論杜詩上繼六朝（見《詩話》：「杜詩本《選》」、「學《選》詩」、「杜詩奪胎」、「劉須溪」、「雕菰」、「羊腸熊耳」諸條）；其早年爲詩，時傷綺麗，得罪戍滇以後，感於少陵《入衡州》「悠悠委薄俗，鬱鬱回剛腸」之語，詩境爲之一變。於杜之晚規庾信，由綺麗、清新以入老成之意，體會尤深；以爲「綺麗、清新，人皆知之，而其老成，獨子美

能發其妙」，因衍之云：「綺多傷質，艷多無骨，清易近薄，新易近尖。」子山之詩，綺而有質，艷而有骨，清而不薄，新而不尖，所以爲老成也。」（《詩話》：「庾信詩」條）此固善發杜詩之旨，實亦升庵是時學詩自得之言。其嘉靖四年入滇途中《乙酉元日新添館中喜晴》（五律）一首，王夫之評云：「重處皆輕，麗處皆切。」（見《明詩評選》）已見其進境「老成」，與少陵「波瀾莫二」。其後，十一年居安寧，有《春興八首》，感事詠懷，沉鬱悲涼，直出《秋興》；昔人亦稱其可媲少陵「夔州以後詩」，（見陳文燭《升庵文集》序）固與夫「但學杜詩聲口」，專工「頓挫倒插之法」者異矣。

一

抑升庵之所以異於時人者，復在於其思想之通脫與眼界之寬廣。

明代爲封建社會後期，中央集權，趨於強化，而程朱理學，如日中天。嘉靖初年，大禮之議，迎合帝意之張璁、桂萼、方獻夫、席書之徒，皆以理學進。升庵始猶斥其「僞學」，謂與張、桂諸人，「學術不同」（見《明史》卷一百九十二《楊慎傳》）。繼而見其顛倒是非，報復奔競，

無所不用其極。乃悟程朱理學之弊，志欲起而矯之。所謂「訓詁章句，求朱子以前六經」者，時方以程朱之道治天下，不敢顯斥其非，託言「訓詁章句」而已（見《答重慶太守劉嵩陽書》）。故升庵著作中，凡議宋人之失者，多指程朱。若「宋人議論多可厭」、「宋人議論不公不明」、「晦庵僻論」、「朱晦庵真西山不識《伯夷傳》」諸條（見《丹鉛總錄》），則直斥程朱之名矣。其論詩，如「唐詩主情」、「宋人論詩」、「沈氏竹火籠詩」諸條，所駁「宋人」之論，亦皆出於《朱子語類》（見《詩話》）。升庵可謂明代前期中反理學之第一人。後來李贄《續藏書》為立佳傳，盡列其著述之目，或出於此。

升庵既不為道學所囿，故其學問文章，幾於無理不可究，無事不可入。博涉多通，於所著見之矣。《詩話》中，亦每取人所不敢取，言人所不敢言。詩之範圍，因而愈廣。苻堅之雋句（「苻堅詩」條），羊祜之疏語（「羊叔子疏語」條），及「子書傳記，語似詩者」，取之；「佛經似詩句」者，亦取之；以至堠子之偈（「堠子偈」條），「剉青」之文（「長安貧兒鏤臂文」條），外國之歌曲（「多根樹」條），彝苗之舞辭（「蘆笙」條），俱所採錄；古今風謡，民間諺語，亦特編成集，為清人彙集《古謠諺》開其先路。其注意於「唐人傳奇小詩」，以為「大有絕妙千古一字千金者」。對於後來胡應麟之蒐集鬼詩，亦大有啓發。真所謂「兼收並蓄」，「細大不捐」，擴大詩歌領域，

其眼光所及，不曾超出時人倍蓰矣。

三

升庵以一代學者，兼爲詩人，嘗謂「詩之盛衰，系乎人之才與學」（《詩話》：「胡唐論詩一條」），又云：「古之詩也，一出於性情；後之詩也，必潤以問學，性情之感異衷，故詩有邪有正；問學之功殊等，故詩有拙有工。」（《李前渠詩引》）是以主張「學詩終於多識」（《異魚圖贊》序），作詩「用字須有來歷」。因論少陵「讀書破萬卷，下筆如有神」之語，云：「此子美自言其所得也。」讀書雖不爲作詩設，然胸中有萬卷書，筆下自無一點塵矣。近日士夫爭學杜詩，不知讀書果曾破萬卷乎？如其未也，不過拾《離騷》之香草，丐杜陵之殘膏而已。（見《丹鉛總錄》卷十九）又謂「胸中無國子監，不可讀杜詩」（《詩話》：「杜詩野艇字」條）。除此而外，升庵更於陶淵明「讀書不求甚解」之言，別疏解會（見《外集》卷六十），以使空吟不學之徒，不得有所藉口。

至於升庵詩學，有裨後世，其尤可稱述者，約有三事：

其一，探究源流，以明詩史。以爲「六代之作，其旨趣雖不足以影響大雅，而其體裁實景

雲、垂拱之前驅，天寶、開元之濫觴」（《選詩外編序》）。因有《千里面譚》、《五言律祖》之輯，以見唐人律詩，起于六朝新體；又舉梁武帝《江南弄》、陶弘景《寒夜怨》、陸瓊《飲酒樂》、梁僧法雲《三洲歌》、徐勉《迎客送客曲》、王筠《楚妃吟》、隋煬帝《望江南》與《夜飲朝眠曲》諸作（並見《詞品》），以證「填詞必涉六朝」，而宋元詞曲，可以貫通於齊梁樂府。此皆切理饜心，爲治詩史者所樂道者矣。

其二，精研李杜大家，漸成專門之學。李、杜二家，世皆宗仰，然自明代以前，論者雖多，專攻甚少。升庵於李白之故里家世，遊歷出處，多所考論。對於二公之襟懷抱負，詩學淵源，以至短長得失，皆綜覈文史，斷以己意。每發前人之所未發。又與張含合選二家詩，李詩百餘首，才取全集八分之一；杜詩約二百首，取七分之一。可謂至嚴至精；批點不作空論，絕去明人以八股衡文之頭巾氣習，往往一語破的。通觀所論，升庵之於李杜，總體而言，殆無軒輊；一詩一體，則敢議其優劣。人或謂其「揚李抑杜」，未必然也。又，升庵於唐絕亦所專研。有《絕句衍義》、《唐絕增奇》、《唐絕搜奇》、《絕句辨體》之作。所論「唐人樂府，多唱詩人絕句」，實後來王士禛以「絕句爲唐樂府」之所本（見《唐人萬首絕句選》序）。至謂杜甫「獨絕句本無所解」，雖非至當之論，要亦有故。王世貞謂杜爲唐絕「變體」（《藝苑卮言》卷四）；胡應麟尤